



山海回响

——读《与一条船谈论大海》有感

黄玉成/文

读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温岭籍诗人张于荣先生的长诗集《与一条船谈论大海》，我心潮难平。这不仅是一场文学的邂逅，更像一次精神的洄游。循着诗人用词语编织的航线，我回到了浸满咸味与闪烁着渔火的故乡石塘箬山。诗集由十二首长诗和一部诗剧组成，分为“溯洄”“渊源”“具象”“在场”四个篇章，在我熟悉的渔村、渔民与渔业之上，构建了一座既通向远古又映照当下的精神灯塔。

诗人并非远观的歌者，而是“亲海劳作者”中的一员。他生于斯、长于斯，对这片海与人的命运有着骨血般的体认。他笔下的海，不是被浪漫化的景观，而是一个充满生命辩证的哲学现场。这让我的阅读体验从对故乡风物的怀念，升华为一场关于生存、记忆与身份的深刻沉思。

张于荣先生最根本的突破，在于彻底扭转了传统山水诗将海洋“景观化”的范式。他没有站在岸上描绘海的壮阔，而是将书写的主体交付给了一条船。诗集的题眼“与一条船谈论大海”，揭示了一种全新的关系。船不再是人的工具或海的点缀，而是

一个独立的、具有生命和记忆的对话者。这条船，是无数讨海人命运的浓缩。在茫茫大海上，这条看似渺小的船，因其承载的生命的意志、对鱼汛的期盼、风浪的凶险、丰收的欢愉与归航的疲惫，成为“主宰天地的唯一力量”的隐喻。

“寂静，等于一种生长……一旦被风吹鼓/定会发出烈马的嘶鸣。”整首诗如同一个精致的能量守恒装置，前半段不断收纳散落的日常碎片，后半段通过风的隐喻将其转化为势能。当静止达到临界点，那些看似被驯服的材料突然显现出野性的本质，这才是诗人与船谈论大海的真正核心。

“鱼类安慰了大海和渔者……我的心，略小于大海。”诗人以“鱼—渔者—海”三元结构，构建了一个动态的生死平衡系统。渔者之死是“在海里的另一种重生”，鱼亡则通过滋养渔者完成能量转化，而大海始终以“不死”的容器姿态承载所有变迁。最精妙之处在于收束时的尺度变幻，“我的心，略小于大海”。这颗既承载着对众生的悲悯，又清醒认知自身局限的心，恰恰因“略小”于大海而获得测量无限的可能。

张于荣先生像一个人类学家和诗人合体的“海洋考古者”，用诗歌凿开了大海蔚蓝的表象。

在《延绳钓简史》中，那纤细的绳线丈量着人类欲望的深度，也标记着自然馈赠的边界，每一次收线都是对蔚蓝的短暂拒绝，也是对自身命运的永恒质询。诗人通过“护犊之心”这一意象，不仅刻画了渔民与海洋之间超越功利的情感羁绊，更塑造了一个在流动疆域中行使父性守护职责的现代海王形象。

《银鲳研究》几乎是一部银鲳的“生命全史”。诗人以科学观察般的精准与神话般的想象，描绘银鲳从越冬、洄游、产卵到索饵的完整生命周期，赋予其神性的光辉。但诗人并未止于礼赞，他尖锐地揭示，这美丽的洄游之旅，终点常是“网伏击”的猎场。产卵场在蜂拥的渔船马力算计下被“掏空”，最终“长成墓碑”。这种对现代渔业暴力的凝视，充满了深切的生态忧患。诗人在此完成了一次深刻的生态诗学建构，他将渔场的崩溃从简单的环境议题，提升至存在论层面的共同困境。

诗集也是石塘生活的“地方志”，它镌刻了我们的赖以辨识故土的一切文化和地理坐标。空间记忆，里簪的古村、鳞次栉比的石屋、清澈的水井，这些地标在诗中苏醒，成为族群记忆的容器；民俗活态，镬火的温暖、大奏鼓的狂放、七

夕习俗的虔敬，这些非遗不再是表演项目，而是族人“用红圈白脸取悦山水”，与先祖和自然沟通的鲜活仪式。

“我年少时最盼望过小人节……我熟悉她的脸/却记不起她叫什么名字。”石塘的七夕习俗“小人节”，不仅是一场民俗仪式，更是一个生命坐标。它通过个体经验的嬗变，揭示了传统节日如何在代际之间悄然转换其意义，成为一种流动的文化血脉与精神脐带。

这一切具体的书写，最终指向一个宏大的主题：为一个跨越数百年的迁徙族群立传。诗人将个人家族史融入海洋的宏大叙事中，这使得诗集具有了“史诗的纵深”。它探讨的不仅是渔民的生计，更是一个族群在动荡的时空中，如何依靠海洋确立自身身份与精神归宿的永恒命题。

当我缓缓合上诗集，《与一条船谈论大海》在我心中激荡的，远不止文学的回响。张于荣先生用他如缆绳般粗粝、又如渔火般温暖的笔触，完成了一次伟大的“招魂”——他为正在消逝的传统渔业生活招魂，为石屋和古村的记忆招魂，更重要的是，为漂泊在外的游子招回了那片始终在血脉里鼓荡的精神之海。

曲韵中的豪气与风骨

——读《我是人间不归宿》

汪恒/文

“江南倦客登临，多少英雄，几许消沉。今日何堪，买田阳羨，挂剑长林。”提及中国古典文学

的巅峰，人们多会先想到唐诗宋词，元曲常居于稍显落寞的位置。徐若央的《我是人间不归宿》为我们推开了元朝曲坛的大门，曲家的人生轨迹与传世佳作相互交织，勾勒出一幅别样的元朝文人精神图谱，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文人墨客如何在颠沛中书写写意，在失意中坚守风骨。

此书选取元好问、关汉卿、白朴、马致远、王实甫等元代曲家的44篇传世名作，聚焦人生命运、理想追求、宦海浮沉、家国情怀、爱情婚姻等主题。作者以优美风趣的语言，用讲故事的方式，生动解读作品背后的深层意蕴，引领我们领略曲家的得意与失意、洒脱与愤懑。全书融曲、史、人于一体，既有诗酒人生，也有家国天下，堪称一部有料有趣、精彩好看的“元曲故事集”。

元朝打破了科举取士的传统路径，大批文人因此失去了跻身仕途的常规通道，从“士大夫”沦为“市井客”。在书中，作者将曲家的创作置于时代洪流与个人际遇中解读，呈现他们对命运的抗争、对人性的坚守。“人老去西风吹白发，蝶愁来明日黄

花。回首天涯，一抹斜阳，数点寒鸦。”公元1314年，元朝第四位皇帝恢复科举，天下学子皆以为迎来光明。张可久参加科举，却发现其间存在不公平的民族歧视。他一生为仕途奔波，却处处受挫。“松花酿酒，春水煎茶。”风雪中，他望不见长安，却望见了归途——心若宁静，无惧苍老。

身份上的落差，并未消磨曲家的才情，反而让他们挣脱儒家正统文学的束缚，将目光投向市井百态、人间烟火。“莺穿细柳翻金翅，迁上最高枝。海棠零乱飘阶址，堕胭脂，共谁同唱送春词？”杨果曲中的女子，面对良辰美景，是思念，也是孤单。“平生不会相思，才会相思，便害相思。”徐再思的曲中，寂静的夜里，女子坐在窗前，想着一个人，念着一段情。“子规啼，不如归，道是春归人未归。几日添憔悴，虚飘飘柳絮飞。”关汉卿的这支散曲，又是一个关于思念的故事。因为爱，四季不再寂寞苍凉。

曲家们以市井为舞台，以笔墨为利器，将喜怒哀乐、爱恨情仇倾注于曲词之中，让元曲成为有温度、有筋骨文学载体。“黄尘鬓发，六月长安道。羞向清溪照枯槁。似山中远志，漫出山来，成个甚，只是人间小草。”元好问被誉为“神童”，少年时即踏上漫长的科举之路。然而国破家亡，屡试不中，回首之际，少年已不再是少年。寂静古道，荒凉无人，他吟出一首《洞仙歌》：“待都把功名付时流，只求个天公，放教空老。”尘世何其艰辛，生命何其卑微！而他怀着一份永不言败的勇气，未曾向命运低头。

在元曲的解读上，作者着力挖掘文字背后的文化意蕴与人生感悟。如关汉卿曲：“适意行，安心坐，渴时饮，饥时餐，醉时歌，困来时就向莎茵卧。日月长，天地阔，闲快活！”这种顺其自然的心境，不拘泥于礼节，不忧心于未来，天地之大，只为自适而活……类似的解读，让读者得以跨越时空，与曲家遥相共鸣。作者还善于将不同曲家的作品进行对比，如将马致远的“悲秋”与白朴的“伤春”并置，展现元朝文人在不同境遇下的情感表达，使读者更清晰地感知元曲题材的丰富与情感的多元。

初闻不识曲中意，再闻已是曲中人。戏台上，一幕幕，一曲曲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唱念做打慰平生。关汉卿在勾栏中挥毫泼墨，马致远在大道上踽踽独行，白朴在梧桐树下感怀伤时……他们在困境中坚守本心，在迷茫中寻得自己的精神栖息地，成就了恣意人生。我们静静阅读，亦可体会埋在世情中的智慧：无论身处何种境遇，都应坚守本心，保持风骨，活成自己心中的一出好戏。

“三牛”精神照初心 三重身份铸传奇

——读《跨越大洋的追求》有感

吴良颢/文

撰写《书香中国看温岭》的著名作家樊国安又有新作问世。《跨越大洋的追求——美国专家阳早寒春在中国养牛六十年》以翔实史料与细腻笔触，生动勾勒出美国友人阳早与寒春跨越国界的耕耘奉献之路。在长达一甲子的岁月里，这对夫妇始终坚守在中国养牛一线，与牛为伴、以场为家，用一生践行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的信仰。“究竟是怎样的力量，让这两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甘愿将一根根植于遥远的东方，将滚烫的心跳汇入新中国建设的磅礴脉搏？”书中将阳早、寒春夫妇定位为“革命者、科学家和工匠的综合体”，这三重身份正好契合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牛年春节团拜会上提出的孺子牛、拓荒牛、老黄牛精神。

老黄牛精神：以工匠之心，守岗位之责

阳早和寒春的“老黄牛劲儿”，体现在他们“爱牛如子”的工匠精神里。阳早常说“脚上一旦沾了牛屎，你就别想冲掉它”，这句自嘲成为他们六十年坚守的生动写照。

作为工匠，他们对养牛的每一个细节都较真到极致。寒春坚决反对把冲洗奶罐的水混入牛奶，牢牢守住“不坏一斤奶”的质量底线；给小牛锯角时，会仔细计算角度，避免伤及牛体；设计牛卧床时，反复调整高度和柔软度，只为让奶牛休息得更舒适。阳早更是细致，给牛建立的档案比给人的还详细，每头牛的血统、产奶量、习性都记录得一清二楚，连哪头牛爱打架、哪头牛挑食都了如指掌。七八十岁时，他们仍坚持每天到牛棚巡查，清理牛粪、检查饲料，下雨天担心牛棚积水，便跟着职工一起疏通排水口。

这种日复一日对细节的打磨、对岗位的坚守，正是老黄牛精神最鲜活的体现。他们以工匠的执着，穷尽一生把“养牛”这件

事做到极致，将“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”的延安精神落到实处。

孺子牛精神：以革命者之魂，践奉献之行

如果说工匠的底色是实干，那么革命者的内核便是奉献，这也是孺子牛精神的核心。阳早和寒春不是来中国“镀金”的，他们是受《红星照耀中国》感召、怀抱“为人类幸福事业奋斗”的信仰而来的革命者，是“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”。而白求恩精神的核心，正是“毫不利己、专门利人”。

寒春放弃了核物理学家的光明前景，来到瓦窑堡农具厂打铁、铡草，双手磨满老茧却只说“不累”；阳早在延安大撤退时，带领三十多头奶牛在陕北沟壑间与敌人周旋，白天藏身窑洞，夜晚踏月前行，拼死保护这批“能让孩子喝上奶”的珍贵财产。他们舍弃美国的优渥生活，身着打补丁的衣服，吃着粗茶淡饭，住在简陋的平房里，却倾注全部心力追求“让全中国的孩子都能喝上新鲜牛奶”的目标。

他们的奉献超越了名利。二人研发的铡草机、挤奶设备，销售近百万台却从不申请专利，无偿推广给农民；三年困难时期，他们主动按普通职工标准领取口粮，把节省下来的物资都用在奶牛身上。他们的奉献也超越了国界。阳早曾说：“在美国是为少数人服务，而中国有八亿农民，为他们服务天地宽广。”这种一心付出、不求回报的奉献，正是孺子牛精神的最好诠释——“吃进去的是草，挤出来的是奶”。

拓荒牛精神：以科学家之智，破发展之局

阳早和寒春这对“中国乳业界的袁隆平”，凭着拓荒牛的勇气，在一穷二白中开拓了中国奶牛业的新天地。作为科学工作

者，他们将严谨、创新的科研思维运用于养牛和农机研发中。

寒春凭借核物理学家的功底，改造苏联产铡草机，使其效率直接翻倍；在没有图纸、没有样机的情况下，她从废料堆里捡拾零件，硬是造出了中国第一台牵引式青饲联合收割机。阳早则将美国的先进养殖技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，在延安首创青贮饲料技术，让奶牛冬天也能吃上青饲料；他还改良了细毛羊品种，其成果至今仍任陕北推广。

他们搞创新从不追求虚名，寒春说：“革新不是为了出名，是为了让农民少受累、牛多产奶。”他们设计的鱼骨式挤奶台、可移动式犊牛栏，将中国奶牛场的技术水平提升了一大截；他们还尝试胚胎移植技术，推动优良奶牛品种快速繁育。这种立足实际、敢闯敢试的探索，正是拓荒牛精神的核心——在未可知中寻找答案，在困难中谋求突破。

阳早和寒春用六十年的光阴证明：工匠的踏实、革命者的奉献、科学家的创新，从来都不是彼此孤立的。老黄牛的坚守让他们扎根大地，孺子牛的情怀让他们不忘初心，拓荒牛的勇气让他们开拓未来。二人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伟大的事业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，而是默默无闻的耕耘。伟大从来不是喊出来的，而是干出来的、闯出来的、奉献出来的。

《跨越大洋的追求——美国专家阳早寒春在中国养牛六十年》这部传记不仅记录了一段跨国坚守的传奇，更让我们看到，延安精神从未过时，“三牛”精神永不过时。在新时代，阳早、寒春的故事依然激励着我们：无论何时，无论身处何种岗位，只要拥有务实的作风、奉献的情怀、创新的勇气，就能创造不凡的价值，就能活出生命的精彩。